

作为假设的“新闻真实”： 新闻报道的“知识合法性”建构

操瑞青

摘要

参借帕克等人的理论,本文尝试对“新闻真实”提出一点新的看法。研究认为,认识论意义上“新闻真实”并非“真实”本身,而是一种“假设真实”。作为一种知识,新闻的“知识合法性”确立一方面有赖于受众的信任与接受,另一方面则离不开媒体的合法化努力。就前者而言,尽管受众无法从认识论层面完全了解新闻是否真实从而只能进行假设,但假设的现实根基及其基本特征不断拷问着报道的社会合法性;就后者而言,力求“新闻真实”并赢得受众信任是媒体追寻合法化地位的内在要求,它不得不采用多重方式来追求真实报道。建基于此,“新闻真实”也被转化成了媒体的职业伦理准则,这一来是为了建构媒体的社会认同,二来则是媒体在对抗外界权力主体时所采用的一个话语策略。

关键词

新闻真实、新闻报道、假设真实、知识合法性

作者简介

操瑞青,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电邮: crqssl@163.com。

Truth in Journalism as an Assumption: Construct the Legitimacy of Knowledge in News Report

Cao Ruiqing

Abstract

By referring to the theory of Park,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understand the truth in Journalism with a new perspective.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ruth in journalism is not about truth itself but assumed truth. As a form of knowledge, news report has to establish its legitimacy in two ways. For one thing, news report must be accepted by audience. For another, the media

must realize the legalization of themselves. As for the former, assumed truth from audience challenges the legitimacy of news report constantly. As for the latter, the media has to pursue the truth consistently in order to attain legalization. On this basis, truth in journalism has become a professional standard of the media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not only help the media to be recognized by others, but also become a discourse strategy of the media to resist others.

Keywords

truth in journalism, news report, assumed truth, legitimacy of knowledge

Authors

Cao Ruiqing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crqssl@163.com.

一、前言

在新闻学风行百年，传播学大行其道的今天，重拾“新闻真实”这个老话题，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为，自新闻学科诞生以来，学界已围绕该问题进行了大量阐发，各类研究推陈出新，很难再谈出一些新东西。不过事出有因，本文的思考源于两点现实困惑。

困惑之一来自“有闻必录”。大凡有所了解新闻学的人，对该说法应当都不陌生。这不仅证明该观念在旧中国新闻界曾广泛流行，也表明它在中国现代新闻传播活动整个过程中，始终没有完全绝迹。只是这个往往伴随着大量虚假新闻且“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的不合常理的观念，居然能够作为当时报纸处理新闻真实性问题的一种原则，在早期中国新闻界流传甚久。对此，时人却也表示“莫名钦佩”（申报，1884），原因何在？查阅当时资料，发现在当时《申报》等报刊眼中，并非没有“新闻真实”这般意识，否则就不会多次强调诸如“务求其真实无妄”（申报，1872）之类的报道准则了。那么，为什么报人会采用“有闻必录”的报道方式而外界又能够接受它？笔者认为，“有闻必录”在某种层面上为我们理解“新闻真实”这一话题引入了历史的眼光，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视野出发展开新的思考。

困惑之二来自一个有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即“假新闻是不是新闻”。笔者曾将该问题简单抛给他人，得到的答案大体可以分成两类。一类认为假新闻不是新闻，因为新闻的核心在于事实，假新闻并不符合；另一类认为假新闻是新闻，就像“白马是马”、“假照片也是照片”一样。乍一看似乎都有道理，但细究之下仍不难发现一些疑惑：第一种观点将新闻与事实勾连在一起，但对什么是“事实”却未予深究，有着将“事实”与“客观存在”等同起来的嫌疑；第二种观点将“新闻”与

“白马”、“照片”等放在同一维度上展开了类比,然而这种类比是否可行却需要打上—个问号,因为后两者是明显的物质实体,而“新闻”能否被认定为物质实体,则需要加以明确的前提限制。这般看来,“假新闻是不是新闻”之所以不易回答,还与“新闻”、“事实”、“新闻真实”等基本概念含混模糊不无关联。这倒不是说,本文要为这些概念下几个定义,而是强调我们在使用特定概念时,应当明确其所指称的具体对象,实现在同一个维度上对话。上述两种观点明显不在同一维度上:前者似乎将新闻理解为“客观存在”,后者则将其理解为“新闻报道”。

是故,本研究为何重提“新闻真实”便不难理解了,因为不论是“有闻必录”还是“假新闻”都与之直接有关。加上近期蒋晓丽(2013)等人从“符号真实”的角度对“新闻真实”所做的有力阐发,以及黄旦(2015)认为在网络化关系下需要对“新闻真实”概念“重新做考量”的观点等,均使笔者颇受启发,故不揣浅陋,抒发愚见。概言之,本文表面上期望解决两个问题,即如何认识“有闻必录”真实观以及如何理解“假新闻”现象。借此,本文试图在整体上对“新闻真实”命题给出一些粗浅的思考,既考察其本身的具体内涵问题,也考察新闻到底能否真实,以及如何实现真实的问题。而思考的起点则在于,新闻为什么应当是真实的,其意义究竟何在。

二、“新闻真实”:概念对象及其相关讨论

“新闻真实”是由“新闻”和“真实”两个复杂概念组合而成的又一个复杂概念,可以做多维阐释。目前相关研究大多没有对该概念的指涉对象予以明确界定,研究者往往带着一个预定的逻辑便展开了论证。在本文中,我们先从“新闻”起步,理解“新闻真实”中的“新闻”,到底指的是什么。

国内关于“新闻”的定义大体可归为四类典型,即“呈现说”、“信息说”、“报道说”和“事实说”。“呈现说”是较为新近的一种提法,认为“新闻”是“现实权力关系新近变动的建构性呈现”,其核心是“权力关系”。尽管笔者认为这一概念仍有商榷的空间,但不否认其将“权力”维度引入新闻学之中所带来的启发。此外,也由于“权力”因素在新闻学中的长期缺席,主流研究中所探讨的“新闻真实”多半不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因而它不是此处的对象。“信息说”由宁树藩(2003: 94)等人倡导,认为新闻是“经过报道或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在这里,“新闻”指的是“信息”。然而,在宁树藩等人的理解中,信息的本源是客观事实,是一种记者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既是“客观存在”,那也就没有讨论

真假的必要了，这也正是“信息说”学者们所持有的观点。他们认为，“真实性并非新闻的特性，因为真实是新闻的前提，如果真实还未出现，信息是假的，新闻就不存在”（宁树藩，2003:95）。所以，“信息”也不是“新闻真实”研究中用来指称“新闻”的对象。

那就只剩下“报道说”和“事实说”了，这也是前言中讨论“假新闻是不是新闻”时所采用的两个路径。“报道说”源自陆定一，他认为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此时，“新闻”所指称的对象是“新闻报道”，指代“新闻作品”，“新闻”实现了“物化”，成了物质实体。建基于此，再将“新闻”与“白马”以及“照片”等物质实体放在一起展开类比便具备了合理性，我们也就可以说“假新闻”是“新闻”了，因为报道不存在“绝对真实”，有真假之分。与之相对，“事实说”则比较复杂，包含两种解释。先看徐宝璜（1919:7）的第一种，认为新闻是“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他所谓的“事实”同样指代“客观存在”，认为“凡凭空捏造闭门杜撰之消息，均非新闻”。由此，“假新闻”不符合“客观存在”，也就不是新闻了。“事实说”的第二种理解来自芮必峰（1997），他认为“新闻不是事实的什么反映，不是事实的报道，也不是事实的信息，新闻就是事实”。芮必峰（1997）表示，“事实”既有主观成分，也有客观成分，因为“人总是根据自身在实践中获得的认识条件来经验和断定事实，他无法超越这些条件去把握绝对客观的事实”。

随后，芮必峰（2004）对“新闻”和“新闻报道”作了明确区分，指出“新闻是人在社会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新闻报道是真的特殊命题构成的陈述”，两者应当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他做了一个干脆的总结：“‘新闻的真实性’其实是一个虚假范畴，新闻无所谓真假，假的就不是新闻，有真假的是新闻报道，所谓‘假新闻’其实是假新闻报道”（芮必峰，2004）。换句话说，我们在讨论“新闻真实”这一问题时，能且只能将“新闻”的对象理解成“新闻报道”，才具备讨论的可能性。

本文认同芮必峰的观点，即新闻真实就是“新闻报道真实”。沿用原有提法，有两点考虑：一是当前研究多从“新闻报道真实”角度展开，尽管没有言明，却已是约定俗成；二是受概念史研究的启发，笔者认为现今人们所谈论的“新闻”通常指代“新闻报道”，前者是人们谈论后者时的“主导概念”。

再看“新闻真实”。杨保军指出，“真实”可以从三个维度理解，包括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实在性”，认识论意义上的“认识与对象之间的符合关系”以

及实践活动中追求“认识与存在的统一，事实与价值的统一”的“实践之真”。在他看来，“作为反映、报道事实世界最新变动状况的新闻活动，本质上属于认识活动”，应当归入“真实”的第二层含义中（杨保军，2006:6）。是故，杨保军（2006:8）认为可以从“符合论”角度来理解“新闻真实”，即“新闻真实与否，就是看新闻与其报道的客观对象是否符合。符合，新闻就是真实的”。该论断不乏洞见，它较早地为人们研究“新闻真实”指出了方向。随着研究的深化，学界不断提出新的见解：¹

第一，有学者不赞成将“新闻报道”与“客观对象”放在同一个维度上进行对比并思考它们是否“符合”的观点。譬如，根据芮必峰的研究，新闻的本体是“事实”而非“客观存在”，所以报道的真实与否，应与“事实”在同一层面理解，而非与“客观对象”放置在一起。蒋晓丽（2003）等人也曾同样指出，“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衡量和判定新闻是否真实的，不是‘客体事实’，而是‘客体事实当事人/目击者’的初次解释意义”。换言之，“客观存在”的事件只有与人发生了关系才能进入人的经验世界并被人们符号化为新闻报道。故而，应该将“新闻报道”与“经历了客观事件的人的经验认识”放在一起讨论。

第二，部分学者认为，对“新闻真实”的讨论不仅涉及认识论层面，还涉及职业伦理层面。邓名琰（2004）表示，新闻真实“不能仅仅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且还必须回答‘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所以“追求并维护新闻的真实性是新闻工作者的伦理准则”；张小元（2007）亦认为“新闻真实”有两层含义，一个是伦理道德范畴，要求“新闻不能够造假”，另一个是认识论范畴，关乎“新闻报道与实际发生的新闻事件的‘同一性’问题”。现实研究中，两条路径确实都存在。如，将“新闻真实”看成是“一个并不复杂的职业要求”明显是从职业伦理角度来谈的，而类似“符号真实”的研究明显从认识论角度来谈的。

第三，另有学者认为，从认识论意义上来讨论“新闻真实”没有意义。张小元（2007）曾质疑，“新闻报道与真实世界发生的新闻事件必然隔绝，那么新闻界追求的、认识论意义上的‘新闻真实’意义何在呢”？他表示，“认识论意义上的‘真实性’不应该是新闻学解答的领域，也不应该是新闻人和新闻媒体应该追求的目标”。姚君喜（2007）也给出过类似的观点，他表示，“‘新闻报道’能否原原本本‘反映事实’？‘新闻报道’如何反映才称之为‘符合事实’”？最终他认为，“‘新闻报道’与‘新闻事实’的完全相符是无法证实的伪命题”。这类观点不无启发，因为新闻报道作为符号化语言，确与“新闻”本体不是一回事，无论我

们将本体看成什么。

上述论断各有其理，但仍不能解释一些困惑。其一，我们不赞成在考量“新闻真实”时将“新闻报道”与“客观世界”放在同一维度上的观点，而应与芮必峰的“事实”放在一起讨论，可是把它们放在一起，仅仅看它们是否符合或一致吗？若果如一些学者所言，根本不可能符合怎么办？其二，研究“新闻真实”确乎存有多条路径，这无法否认；我们可以只考虑其中某一条路径，这也没有问题。可是，这几条路径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如果有，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其三，如果新闻报道与新闻事实永远无法符合或一致的话，认识论上的“新闻真实”就真的没有意义了？那为什么会说“假新闻”，为什么会说“报道失实”？

在此之外，杨保军（2005）还曾指出，“新闻真实的实现是由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双重主体共同完成的，是由真实报道和理解真实、相信真实共同构筑的”。蒋晓丽（2003）也曾表示，新闻的“符号之真”意味着“新闻是多方符号解释主体互动建构的产物，充分肯定了新闻传受过程中每一符号解释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笔者认同这类观点和看法，认为“新闻真实”不能将视野仅放在传者身上，还应该关注受众。毕竟，诸如“假新闻”之类的说法当由受众提出，而非传者本身。由此出发，本文认为，“新闻真实”的命题应当包含三层内容：（1）新闻报道应该真实。这是最根本问题，涉及人们对新闻的理解；（2）新闻报道是否真实。该问题有着明确前提，即报道已出现，否则无从谈起，所以它一般由受众实施；（3）如何做到真实报道，这是传者的判断与责任。下文的叙述，将分别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

三、作为知识的合法性：为什么“新闻报道应该真实”

考察“新闻真实”，不得不回到起点上去思考一个问题，即：新闻报道为什么一定要是真实的？自中国新闻学诞生以来，对该问题的回答一直比较仓促。笔者揣测，这当中至少有两点缘由。一方面，或是由于该命题有种不证自明的“魅力”。因为它涉及到当前新闻活动存在的根本意义，一旦该命题不成立，整个新闻事业将无所适从；另一方面，或与中国的新闻真实观念源于西方有关。源自徐宝璜等人的新闻真实观念往往来自欧美等国，囿于现实条件，早期学者难以在深入反思基础上予以批判地接受。且不管具体因素如何，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在国人的第一本新闻学专著中，徐宝璜（1919:7）已经对该问题持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了，认为“新闻须为事实，此理极明，无待解释”。也就是说，他直接跳过了这个

问题。当前学界在研究“新闻真实”时，也常常以“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作为应然的推理前提，再次跳过了该问题。当然，并非全然没有人关注并回答过该问题，新闻学界至少给出了三种解释：

第一种认为，新闻报道之所以应该真实，是因为“古今中外，人们都视真实为新闻的生命”（胥亚，2004:178）。这一观点常见于各类新闻学教材或研究中，事实也确乎如此，大家都十分看重新闻是否真实。但这样的回答颇有点循环论证的味道，也就是说：因为大家都认为新闻需要真实，所以新闻就应该真实。仔细想想的话，它其实没有回答任何问题，只是重复了问题本身而已；

第二种观点认为，新闻应该真实是由“新闻的定义决定的”（林枫，2005:125）。然而，新闻的定义本身就是一个至今未能完全讲清楚的东西。如果一定要说是新闻的定义决定了新闻应该真实的话，那是新闻的哪个定义决定的呢？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关于新闻的定义有几百种。不可否认，陆定一的“报道说”包含着“事实”，说该定义要求新闻是真实的，可以理解。但是，“报道说”不是绝对的真理，它的质疑者与认同者可能两相参半。如果我们回到前文提及的“呈现说”来看，它就没有这个要求。因此，该说法只会将人们对“新闻”定义的困惑延伸到“新闻真实”身上，并不能很好地帮助人们理解问题本身；

第三种说法较有说服力，它认为新闻真实不是个人决定的，而是“出于人类求生存、求发展的需要”（黄凤鸣，2007:127）。该观点在宏观上较有解释力，可落到微观上追问一下，也不难发现一些困惑。比如，对于某一具体的报刊来说，它通常应满足的是谁的需要呢？可以肯定，不是全人类的需要，因为或许没有哪个报刊敢宣称自己始终关照着全人类。那是读者的需要吗？似乎也不一定。比如美国政党报刊时期，互相攻讦的政党报显然不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退一步说，即便承认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可是读者需要的，就一定是真实吗？同样不一定。比如，历史上的《申报》曾真实报道“汉口革命军败退的消息”，但却“遭到千余群众的围攻，认为这是替清政府宣传，动摇人心”，最后砸了报馆。甲午海战时，《申报》也曾如实报道战况，但却使许多读者难以接受，他们“指责《申报》‘助敌’，有人甚至出钱以广告形式要求《申报》刊出‘胜倭确信’的文字”（刘青松，2012:20）。由此观之，新闻真实到底是谁的需要以及何种需要的问题，在现实中似乎难以说清。

笔者认为，对为什么“（1）新闻报道应该真实”这一问题的回答，决定了研究“新闻真实”命题的视野与取向，关于问题“（2）新闻报道是否真实”和问题

“（3）如何真实报道”的叙述都需要围绕它展开。事实上，对问题（1）的回答，有着多种不同的视野，难以一概而论，且不同视野之间也并不存在什么对错之分。如，从传受双方的“交往”视野出发，考量“新闻真实”在传者与受者之间实现意义共享与生成中发挥的作用，即是一种思路。因此，本文无法表示能够完全回答该问题，仅尝试着转换视野，提出一些不同的想法。

笔者的想法需回到帕克（Park, R.）关于新闻的理解。参借詹姆斯（William James）对于知识的“知晓型（acquaintance with）”和“理解型（knowledge about）”类型划分，帕克（1940）提出了“作为知识的新闻（news as a form of knowledge）”的观点，认定是新闻是一种偏向于“知晓型”的知识类型。该洞见的意义在于，它将新闻纳入到了知识领域，打开了一扇新的思维之窗。进言之，既然新闻是一种知识，那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知识的合法性”这一核心问题，“它关乎知识能不能成立、是不是知识的最终根据和解释原则”（郝鸿军，2007）。利奥塔（Lyotard, 1996:47）认为，建构“知识的合法性”需考虑两点，即“知识如何可能”和“谁决定什么是知识以及谁又决定什么必须被决定”。前者指的是某种知识类型如何被社会认可并接受，它关乎了知识的定义和内容形态的合法性；后者则指的是谁能够生产并传播这些知识以及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它关乎了知识生产者的地位合法化。

先看利奥塔的第一个问题，它涉及到新闻报道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合法性。在帕克的勾勒下，“新闻意在使人们和社会熟悉实际的世界，以此保持个体心智正常和社会有序。所以，新闻的价值是实用而不是欣赏……新闻就是这样的一种‘公共记载’”（黄旦，2012）。既是“公共记载”，新闻便是一种能够让人们“熟悉实际世界”的知识。因而，这种知识要获得合法性，“必须要得到读者的信任而不仅是满足读者需求”（Karlsson, M., 2011）。也就是说，新闻报道要想被社会接受，就应该赢得人们信任并帮助人们了解现实世界，如果它能做到，也就确立了自身的合法性。再看利奥塔的第二问题，它包含了两个小问题。首先，对于新闻这种知识来说，“谁决定了知识”相对容易回答，显而易见是媒体决定了什么样的内容能成为新闻报道并被传播；其次，谁又决定了媒体可以这样做呢？这就涉及到媒体的合法化问题，相对复杂。在不同的媒体类型中，国家行政的认可、商业财团的认可、政党的认可等都可能成为其合法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程序。这里，我们暂不逐一展开，仅强调一点。即，无论前述几点怎样变动，受众的认可对于任何一个媒体的合法化追寻都是必不可少的关键。因为，一个没有任何受众的媒体不可能存在。

厘清这两点,便可尝试回答为什么“新闻报道应该真实”了:从知识形态角度来说,一方面,新闻报道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类型,意在帮助人了解现实世界,其合法性的确立有赖于人们对新闻的信任和接受;另一方面,“真实是信任之源”(何光先,1983:55),判定新闻真实与否往往成为人们决定是否要接受新闻的一个关键问题,所以人们要求新闻是真实的。从知识决定者角度来看,媒体作为新闻生产者与发布者,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受众的基本要求,譬如“新闻真实”,帮助他们了解现实世界,从而最终实现自身的合法化。²

据此而言,“新闻应该真实”是新闻报道建构其知识内容合法性的必然要求,也是新闻媒体实现自身合法化的必然追求。不过,在本质上,该命题依然是一个价值论问题。如前所述,新闻报道作为一种知识类型,需要体现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并据此形塑自身的知识合法性。“真实”正是新闻报道在体现自身社会价值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重要方式,它既告诉人们为什么新闻本身是有用的,也告诉人们为什么新闻的生产者,即传媒是可信的。简单地讲,“新闻应该真实”在特定的维度上,回答了新闻本身为何能够被社会需要的问题。

引入了“知识合法性”视角,可以回过头重新审视前文的三个问题。第一,“(1)新闻应该真实”是一个价值论问题,集中体现了新闻作为一种值得被人们信任的知识的合法性要求,刚已论证,不再赘述;第二,“(2)新闻报道是否真实”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且应当以受众为中心,即受众先要判定真假,然后才能决定是否信任并接受该新闻。所以,问题(2)其实影响了新闻报道在知识内容上的合法性,即受众为何需要接受它;第三,“(3)如何真实报道”是一个职业准则与道德伦理的问题,它规定了传者对于真实的持续追求。这倒不是说传者不需要从认识论角度去了解新闻的真伪,而是说传者的追求主要由受众引发,根本目的主要在于赢得受众的信任。所以,问题(3)主要是一个伦理准则问题而非认识论问题,它关乎的是媒体作为知识生产者地位的合法化。

由此不难意识到,无论是新闻本身的要求,还是传者与受者的诉求,最终的落脚点往往都在“信任”而不是“真实”上。换句话说,受众“只要信任”新闻是真实的,他就可能赋予其合法性;而媒体只要“让受众信任”新闻是真实的,它就可能实现合法化。

那么,“真实”与“信任”到底是何种关系呢?大体可以作如下几点理解:其一,信任涉及的对象包括传者、受者和报道三者,并以后者串联了前两者。无论是受者的信任,还是传者的被信任,都是以新闻报道为中心展开的;其二,就受者而

言,其所认定的“真实”即是对新闻报道本身的信任,即相信该报道是真实的。不过,在该过程中,传播者作为内容生产的主体是否值得信任,成为了受者判定报道是否值得信任的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其三,就传者而言,若想实现“真实”,既需要使自身作为新闻生产者的地位得到受众的认可与信任,也需要使得新闻报道的文本能够应对受者的检验。钟蔚文等人(1999)曾对此有过形象地描绘,他们指出,记者在报道过程中,所遵循的是“雄辩胜于事实”的原则,他们既宣称自身是值得信任的(如采用第三人的口吻),也宣称其报道内容是值得信任的(如引用事件当事人的观点)。因此,以“信任”为中心所形塑的新闻真实,在传者层面上可以被看成是传播者对受传者的主动“游说”(钟蔚文等,1999),一旦游说成功,真实便也实现了。

如果能接受上面的论证,下述观点就不会太危言耸听了:围绕新闻真实所展开的全部新闻报道实践活动,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从来都不是“真实”,而是“信任”,“求真”只是“求信”的一个必要而不充分条件。顺着这个思路往下延伸,“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个观点在认识论意义上同样值得怀疑。如果说这里的“新闻”指的是本体意义上的“事实”,那“真实”就是必然的,无所谓真假,这句话也就毫无意义;如果说这里的“新闻”指代了“新闻报道”,那不真实的假新闻报道为什么能够存在呢?换句话说,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何以能够存在?所以,“真实”并不是新闻(报道)的生命,“信任”才是。正因如此,不真实的假新闻肯定存在,完全没人相信的假新闻一般不会存在。³

在此之外,如果整体上来看待“新闻真实”,而不从多个维度予以明确区分的话,会发现几个有意思的现象:第一,“新闻真实”在帮助新闻报道确立其知识形态上的合法性的时候,是从认识论前提出发的,但最终目的却落在了价值论维度上,即新闻能否值得信任并帮助人们了解现实;第二,“新闻真实”在帮助媒体实现其合法化的时候,同样是从认识论角度出发的,然其最终目标却在于赢得信任,建立职业伦理与职业认同;第三,认识论的视野尤其关键,并非毫无意义。它既涉及到传者,也涉及到受者,既勾连了价值论问题,也勾连了伦理准则问题。将它们放在一起理解,能够回答前文提出的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在“新闻真实”研究中,认识论判断、价值论取向以及伦理准则等维度常常难以完全割裂。⁴

四、“假设真实”与报道合法性:受众对“新闻是否真实”的判断

回答了为什么“(1)新闻报道应该真实”之后,便可进一步追问“(2)新闻

报道是否真实”的问题。不难理解,该问题主要关乎了新闻报道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合法性问题,即新闻报道确立其合法性的关键在于提供真实的内容以赢得受众的信任和接受,从而帮助人们了解现实世界。可是,人们对报道的信任与接受就意味着新闻一定是真实的吗?既然前文认为“信任”才是新闻的生命,是不是可以说,如果一个虚假伪造的新闻报道能够被所有人都接受的话,它同样有可能确立自己的知识合法性呢?如果不是,前文的论证就是错误的。如果是,我们到底该如何从“新闻是否真实”这个角度来理解“新闻真实”呢?这一部分,我们先引介一种理论观点,并由此出发尝试回答这一问题。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于人性的假设所在多有,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政治人”假设、“经济人”假设及“文化人”假设等。即便在新闻传播领域,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也曾提出以“信息人”作为“社会和传播研究基本假设的主张”(胡翼青,2012:54)。或是循着同样的逻辑,教育学学者吴康宁于2005年提出了“假设人”假设,形成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力。他认为,人的一种恒常状态便是“在假设的世界中生存”(吴康宁,2005)。从日常生活来说,人对于事物的认识往往是一种“依然带有假设性成分的常识性判断”,因而人的认识“是不断变化、允许变化的,这世界上大概没有什么认识是绝对正确、永远不变的”,“我们的认识永远处于有待验证的假设状态,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完全验证假设”。

“假设人”观点带来了震撼,也带来了惶惑。面对这种带有“不可知论”色彩和“虚无主义”幻像的观念,有学者予以了修正。李长伟(2007)引入了价值论维度来警惕“假设人”可能带来的意义虚无化,程天君(2012)则为“假设人”补充了一个本体论前提。笔者认为,“假设人”观点相对偏向科学技术领域的思考范式,对人文领域的关照稍显不足。因为人的假设离不开另外三个重要维度:一是作为“生存世界”的本体论前提。离开该前提,人的假设便成为了无源之水或无本之木,如何假设以及为何假设都无从谈起;二是作为意义追寻的价值论维度。韦伯(Weber)认为,“人是悬在由人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我们很难走出这张“意义之网”去审视纯粹的客观世界而不添加意义;三是作为个体的人的主体性,认识论上的“假设”能告诉我们人是在假设的,本体论上的“假设”能告诉我们假设离不开“生存世界”,而主体性意义上的“假设”才能够具体回答为什么我们提出某个假设以及为什么提出的是这个假设而不是那个假设。

尽管如此,笔者依然受到“假设人”对于真假阐述的启发,并期望借此反观“新闻真实”问题。参借该观点,我们不妨设定一个“假设”,即:人们判断新闻

报道是否真实时，往往也是一种假设行为；它并不意味着报道本身完全真实，不过是人们相信它是真实的而已，因而所谓的“新闻真实”事实上是一种“假设真实”。这一“离经叛道”的假设确实不易被证明，笔者只能退而求其次，采用反证法。换言之，我们只要将“受众对新闻真实与否的判断不是一种假设”证伪便可以了。

“不是一种假设”至少意味了三点：第一，人们在接收某一新闻报道后，会始终对报道的所有内容作出真实与否的判断；第二，人们可以对报道中的所有内容给出真假判定的依据；第三，既然有着明确的依据，那么所有受众对于同一报道是否真实的判断应当是一致的。然而，仅仅是从日常经验出发，我们已经能够断定这三点并不成立。因为，应该没有人会对自己接收到的所有新闻报道的所有内容进行真假判断，也很难找到全部的判断依据，而不同受众对同一新闻的判断结果也往往并不一致。所以，笔者坚持自己的假设，认为受众眼中“新闻真实”是一种“假设真实”。此处简单举两个例子，进一步论证。

（1）国家主席习近平29日在人民大会堂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认为，中土双方要明确两国关系发展大方向，筑牢政治互信根基，在彼此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光明日报》2015年7月30日01版）

（2）昨天上午10点多，大厂一带的室外气温高达36摄氏度，化工园公安分局西厂门派出所值班民警接到报警，称一位96岁的老大爷在一菜市场里晕倒。（《扬子晚报》2015年7月30日A3版）

上述任一报道，读者能断定它是否与“事实”相符吗？能够断定谁是“完全真实”的吗？似乎都不能。《光明日报》的报道，一般读者是没有机会去核实其内容真实与否的，我们很难寻找到判定它是否完全真实的依据，因为不大可能去找两位国家首脑进行核实。《扬子晚报》的报道核实难度似乎小一点，但一般读者谁会去做这件事呢？那么，会有人认为上面两则报道是不真实的“假新闻”吗？应该同样不会。这说明，受众层面的“新闻真实”是一种“证伪”判断，如果无法“证伪”，受众便相信它是真的，无论报道本身是否真实。

我们再来看两段文本，希望借此进一步证实“假设真实”观点：

（1）电视新闻最大的感染力来自于直播报道，直播的现场性和不可预知

性,使新闻报道更加真实,也更具有期待性。(载《中央电视台获奖作品赏析(第2辑)》)

(2) CCTV-9的记者还充分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直接采访了旁听“两会”的外国驻华使节和“中国问题观察家”,客观地报道了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对中国政府的评价等,使我们的报道更加真实可信。(载《中国新闻年鉴(2004)》)

这类论述常见于人们对新闻报道的评价中,相信多数人都不会觉得它们不妥。可一旦深究下去,便不难发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两段文字中都给出了一种说法,认为“新闻报道”可以“更加真实”。可是,如果说真实与否是一个认识论上的绝对判断的话,它要么是真,要么是假,怎么能“更真”呢?就像有学者追问的那样,“如果我们说,某一事物比另一事物更加真实,这有意义吗”,真实“是能够升级的吗”? (西皮尔·克莱默尔,2008:190)从“假设真实”的观点出发,便可以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因为,受众的判断往往不是绝对的真或假,他只是假设新闻报道是真或者假,有时甚至是怀疑不定的。这种情况下,如果某报道较之另一报道更加全面客观的话,说前者比之后者“更加真实”也就没有问题了。⁵

从新闻的合法性来看,其关键在于人们信任该报道并认为它可以帮助自己了解现实,并不在于报道是否完全真实。说到底,信任也是一种假设。恰如吉登斯(Giddens,2012:225)所言,“信任本质上与风险和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当你百分之百地信任某人或某种制度时,你就不再需要‘信任’这个词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支持信任的机制存在”。同样,如果受众都能够在接收某个新闻报道后百分百判断它是真实还是虚假的话,“假新闻”也就不会存在了。对于具体的新闻,受众往往没有绝对能力去判断它到底是真还是假,只能根据一定条件,对其进行“证伪”,若无法“证伪”,便假设其为真。所以,假新闻都是一种报道后的再判断,有的已过了很久。譬如1980年的假新闻《钱被风刮跑以后》甚至获得了当年的“中国好新闻奖”,事后才被戳穿,甚至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它是真的。

“假设真实”很难“讨喜”。一来,它带有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笼罩了一层“说你真你就真”的影子;二来,它仿佛消解了受众的能动性,因为如果受众所谓的“真实”是“假设真实”的话,媒体便可胡作非为了;三来,“假设真实”似乎不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知识增量,无非只是借鉴了“假设人”观点。看似如此,实则不然:

存与存在，就不会有关于人的假设”，因而“人之认识论中若有‘假设’，这一假设也是依存于人之复杂多变的生存境遇的”（程天君，2012）。“假设真实”需要条件，条件之一便是源自社会实践的“社会共同认知的范围”（芮必峰，1997）。报道是事实的陈述，而“事实”则是人类对客观存在的经验认识，同一个时空下的人的认识具有一致性。一旦报道超出这个范围，人们便很难相信。借此可对“有闻必录”的早期报道予以一定解释，因为在晚清中国，时人对客观存在的经验认识是与当下并不相同，所以一些当下所认为的假新闻在当时并非如此；

其次，受众的“假设真实”还与该新闻“能否帮助了解现实世界”的价值论维度以及作为个体的人的主体性有关。一方面，那些并不能帮人们了解现实的新闻报道是真是假，受众常不予关注，报道本身也难以借此确立合法性。被“证伪”的“假新闻”往往有轰动效应，如“华南虎事件”和“纸馅包子事件”。这些报道若非弄虚作假，完全可能改变人的认识或者拷问人类道德底线。与之相对，《钱被风刮跑以后》便“精巧”多了，它选择了一个无关痛痒的话题，闪现了一点人性的光辉，若不是戴上了“好新闻”的光环，一般受众都不会将其“证伪”。另一方面，从个人的主体性出发，受众对于新闻真伪的判断还带有一定的私人化倾向。即对同样一则新闻，一些人可能认为它是真的，另一些人则不然。但这种情况的出现既与个人的具体经验认识有关，也与新闻报道与个人之间关系的深浅有关，因而通常只具有特殊性而非普遍性，很难影响到新闻报道的合法性建构；

最后，正如吴康宁（2005）所强调的那样，作为假设的判断应该是“依然带有假设成分的暂时性的推断”。这表明，“假设真实”是受众对于新闻报道的一种暂时性信任，广大的受众还在持续地对新闻报道本身进行着判断。所以，受众与媒体之间形成了一种“契约性关系”，即“我相信你，但不代表我不怀疑”。一旦某个报道被受众发现存在不实并广泛公开的话，将会严重损害这种关系，影响到媒体本身的公信力。这不仅会消解该媒体此后的新闻报道作为知识的合法性，也将消解该媒体一直以来合法化努力。所以，“假设真实”的意义不在于认定为是真实还是虚假，而在于从不间断的“假设”。也正是这种不间断的“假设”不断拷问着新闻报道的合法性，不断迫使着媒体时刻紧张于自身的合法化努力。

进言之，从受众角度来看，认识论上的“假设真实”若能够成立，其对新闻报道的信任关系必须建立。那么，赢得受众信任的前提对象到底是什么呢？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受众所信任的对象主要有两点：一是对传播者，即作为信源的新闻生产者的信任。若这一点不能成立，受众往往对新闻本身也抱有了更多的怀疑；二

是对一定社会语境下所形成的社会文化共识的信任,也就是对“社会共同认知的范围”的信任(芮必峰,1997)。钟蔚文等人(1999)曾将这类“共识”划分为“社会的自然态度”“文化的逻辑和常识”以及“语言的传统和成规”。举个极端的例子,在前哥白尼的时代,若报道中指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该新闻或许不会被认为是假新闻。但是在今天,这类报道无疑会被人们归为假新闻的行列。

五、“假设真实”与媒体合法化:“如何实现真实报道”的思路

最后一个问题,“(3)如何实现真实报道”。这是学界在研究“新闻真实”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它关乎了媒体的合法化努力,即媒体能不能承担其作为“新闻报道生产者与传播者”的社会地位。表面上看,该问题只有一层含义,即媒体应该怎样去实现真实报道,它谈论的应该是报道的方法;不过实际上,其背后还隐藏着一个认识论问题,即媒体(记者)能否真实的把握事实、认识事实。

我们先明确一点,即媒体的合法化过程受限于多重因素,诸如国家行政的审批、商业财团的控制、广告主的制约,等等。这当中,实现真实报道并赢得受众的信任和接受,仅仅是其一部分而非全部。故此,我们不得不给此处的论述定下一个稍显“悲观”的基调,那就是:整体上讲,媒体永远不可能如实反映新闻事实并在这层意义上实现所谓的“真实报道”。因为,不同的权力主体对于媒体在合法化过程中所提出的要求完全不同。在受众看来,是为了了解现实世界,要求媒体最大程度上体现真实;可在政党看来,目的是实现政治目标,要求媒体反映政治立场;在控制财团看来,目的是实现经济效益,要求媒体不断盈利;等等。正因如此,没有哪一个媒体能够只考虑受众而忽视其他权力因素,否则它将难以长期生存。这一点,只要想一想于右任先生“竖三民”三份报刊的最终遭遇,便不难理解了。

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媒体所能实现的真实依然是一种“假设真实”。理由有三:一,即便仅仅谈论认识论层面的那个隐藏问题,“假设人”观点同样告诉我们,媒体(记者)并不能保证自己能够对“事实”的判断与认识完全真实。因为,判断或假设有着明确的本体论和主体性前提,不同时空下的不同主体对同一事件的认识难以完全一致;二,媒体不可能忽视其他的权力主体,它在特定的新闻报道中不得不对改变自身的报道策略乃至报道内容以实现多维权力主体之间的平衡;⁶三,早前的“新闻真实”研究往往将“事实”与“陈述”之间是否符合或一致作为判定真实与否的标准。但现今人们已无法否认,“在实际项与表述项之间存有天然断裂”(王辉,2012),不可能实现这一点。因而,后期学界所提出的“外延真

实”、“符号真实”等在广义上都可以理解为传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真实”，是一种“建立在互主体性或主体间性、主体际性基础上”（芮必峰，2004）的“理解真实”。

媒体所能实现的“假设真实”，在认识论意义上，与受众有着共同的信任对象，即“社会文化的认知共识”，这是不可逾越的基础。尽管媒体无法完全脱离个人或集体的立场等其他信任因素的制约，但都不能跳脱社会共识的范围。那么，这种同样作为假设的“新闻真实”对媒体来说，还有意义吗？仍然有，至少也有三点理由：第一，面对多维权力主体，媒体不是全然被动的存在，“新闻真实”的理念被媒体有效地转化为职业伦理与职业准则，形成了社会认同。基于该认同，“新闻真实”成为了一种有效的话语策略。它一方面可以作为媒体反抗权力主体的有效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媒体在受众群体中赢得信任；第二，“假设真实”并不表明追求“新闻真实”毫无必要。毕竟，并非每一则新闻报道都会牵涉到太多复杂的权力因素，多数新闻报道仍然停留在“认识事实与报道事实”层面。所以，认识论上的“假设真实”对媒体来说，首先意味着媒体要确信自己的认识是真实的。这要求媒体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不能带有任何的不确定因素或者明显的“可证伪”因素；第三，来自受众群体的“新闻真实”要求不断倒逼着媒体的“新闻真实”，因而媒体不得不在方法上改进自身报道，以最大限度上经受住来自受众不断“假设”的考验。这当中，后两点又是实现第一点的前提，因为媒体只有不断追求真实，人们才可能将“新闻真实”认同为其职业伦理准则。

先看第一点，即作为职业规范与伦理的“新闻真实”，它对媒体的合法化来说尤其关键。简而言之，既然受众始终有着“新闻真实”的现实要求，那么在记者的职业化发展中，将“新闻真实”作为基本的职业准则便无可厚非，它有利于形成自觉的职业规范，满足社会需求。此外，当新闻实现专业化发展后，将“新闻真实”作为基本的专业要求，不仅能够实现媒体内部的自我认同，还将有助于其获得社会认同，实现媒体的合法化。

媒体的合法化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追寻社会认同的过程，一旦社会认可了其作为“新闻报道生产者和传播者”地位之后，媒体便掌握了一定的权力。正因如此，“新闻真实”的职业准则发挥了双重作用，它一方面有助于媒体赢得社会认同，实现合法化；另一方面也成为合法化之后的媒体反抗各类权力主体的有效手段。以“有闻必录”真实观为例，史学界认为，历史上的《神州日报》所发大量革命的消息，尽量不由本报记者出面，而是打着“有闻必录”的旗号，因此“有闻必录”是

媒体打着的幌子。我们认可这种说法,但还可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是“有闻必录”的幌子而不是其它幌子呢?从媒体合法化角度来看,便不难理解。因为,“有闻必录”观念在当时社会中属于一种赢得了职业认同与社会认同的新闻准则,它建立了媒体的话语权,媒体便可以借此对抗其它权力主体,实现一定程度的反抗。

再看后两点,第二点强调的是媒体可以实现真实报道,第三点则关注媒体实现真实报道的方法,它们可以放在一起论述。如前所述,从认识论上的“绝对真假”来讨论媒体能否实现真实报道是没有意义的,媒体所能实现的依然是一种“假设真实”。只不过,这种“假设真实”要想帮助媒体实现自身的合法化,有着明确前提,即经受得起受众不断“假设”的考验。要实现这一点,媒体应当与时俱进地不断改变报道方式,在方法上不断完善。本文尝试根据受众在判断新闻真假时所采取的一般路径,提出相应的实现“新闻真实”的办法:

第一,“事实”是否存在。如果事实不存在,受众必然会断定其属于假新闻,丧失对媒体的信任。这要求媒体不能胡编乱造,不能像“纸馅包子事件”那般去“制造新闻”。此处可补充一点:前文认为受众不可能对所有新闻进行辨别,那是不是说,媒体只要编造一个假新闻但不引起受众注意就没事了?理论上讲,确实如此。譬如《钱被风刮跑以后》,若不是“中国新闻奖”将它从一个“地方新闻”变成一个“全国性新闻”,或许直到今天依然没有人知道它是假新闻。然而,我们不能忽视媒体的另一种诉求,即任何媒体都是以“注意力”为导向的,媒体总是尝试各种办法吸引受众注意,包括制造假新闻。所以上述问题是一个悖论,即如果制造假新闻而不引起受众(其他媒体同行也是受众,而且颇为关键)注意,那假新闻还有什么意义呢?媒体只承担着可能的风险,却得不到任何“好处”,似不明智。同理,无关痛痒的假新闻,会因为缺失了注意力而丧失了影响力,难以动摇新闻事业本身。⁷

第二,是否准确全面地呈现了新闻事实的各关键要素。新闻报道的各个要素是最容易被受众“证实”或“证伪”的部分,任何增加虚假新闻要素或者刻意隐藏新闻要素的做法也同样易于被受众觉察。这与上一点有很多类似之处,不再赘述。

第三,对于事实的认识与判断能否让受众信服。这或许是媒体最难做到的部分,因为它不仅涉及到“真实”问题,还涉及到“信任”问题。如前所述,“信任”是新闻报道确立合法性的关键,“真实”只是实现“信任”的一个必要条件。然而在特殊背景下,“真实”可能并不是实现“信任”的条件,起码不是最主要条件。前文“《申报》馆被砸”即是其中一例,这里再举一例。1937年到1945年前

后,我国新闻学研究进入到了“战时新闻学”的阶段。该时期,人们常常并不十分重视“真实”,张友鸾表示,“我们要对国家民族忠实,我们就得放弃目前不必要的小信用”(李秀云,2004:184)。在两个例证中,“立场”往往取代了“真实”,成为建构报道合法性与实现媒体合法化的重要条件。

说明了这一点,便可从正常语境下思考媒体如何让受众信服的方法。对此,黄旦与王亦高曾分别提出两条路径,“全面”与“证伪”。本文认为它们一正一反,可互为补充。黄旦(1997:253)从正面给出了方法,指出“所谓全面,就是指不以孤立的、静止的眼光去看待事物,而是从事物总体、社会的总体联系中来考察、评判事实”。这就要求媒体(记者)有着开阔的视野,能够使用发展和联系的眼光来辩证地认识事实。王亦高(2006)从反面出发,认为新闻报道的“证伪”“就是要为其报道对象规定‘可证伪性’,或者说,该报道所设置的报道对象是该报道所要‘攻击’的标靶,要用证伪的过程去揭示它、考验它”。采用“证伪”思路,笔者十分认同。这与受众对新闻真伪的判断站在了同一个角度,他们往往难以证实某个新闻报道,却相对易于去“证伪”。在现实的新闻活动中,两种方法可以并用,前者有利于提升对于事实理解的深刻性,后者则可以有效提高新闻报道的准确性。

六、结语:知识合法性视野下作为假设的“新闻真实”

走笔至此,我们将对文章观点稍作总结,并简要回答前文提出的相关问题。

将新闻看成是一种知识,从知识合法性的角度出发,能够认识到,“新闻真实”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它是新闻报道赢得受众信任、被社会认可与接受的关键,这是一个价值论的命题。为实现这一点,“新闻真实”有着两种实践中的理解路径,一是受众角度,它建构了新闻报道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合法性,这是一个认识论的命题;二是传者角度,它帮助媒体建构了其作为知识生产者的合法化地位,这主要是一个道德伦理与职业准则的命题。

据此观之,“新闻真实”至少可以从价值论、认识论和伦理准则三个角度出发,进行综合阐释。而在三个角度中,认识论的视野又最为关键,它直接与另两个角度产生了联系。本文认为,在认识论层面,新闻真实就是要考量报道与“事实”之间的关系。然而这种考量不是从“证实”角度去看它们是否符合,往往只能从“证伪”角度去看它们是否“不符合”,因而此时所谓的“新闻真实”,其实是一种“假设真实”。进一步来说,“假设真实”的目标在于形塑受者对传者及其报道内容的信任关系,并最终在二者之间达成一种认知共识。只有实现了这一点,新闻

才有可能成为一种偏向于经验性的知晓型知识，在现实世界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与早期的“符合论”观点有所差异：其一，判断标准不同。“假设真实”关注的是新闻报道与“事实”而非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两相之下，前者与人发生了关系，后者则将人抛弃在外。也就是说，此处并非抛弃“符合”这一判定真假的原理，但强调了标准的改变；其二，判断方式不同。“假设真实”强调的不是从正面出发的“对应”，而是从反面出发的“证伪”；其意义不在于认定绝对的真假，而在于从不间断的假设和判断行为本身。

关于“假新闻是不是新闻”的问题，回答是肯定的。不过这里有着明确的逻辑前提，那就是“假新闻”实际上指代的是“假新闻报道”。因为就“新闻”本体来说，它作为一种“事实”无所谓真假，所以若要在这层理解上提出“假新闻”的概念，没有任何意义。正因如此，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便已经默认了它指代“新闻报道”，也默认了“假新闻就是新闻”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仅仅从逻辑上区分新闻报道的真与假，仍然容易走进一个本质主义的陷阱，即天然存在所谓的真新闻或假新闻。这是本文并不认同的观点，其区分真与假的标准仍然只是客观世界，脱离了主观认知。“假新闻”应当是主客观共同作用的产物，它既是一个时间的范畴，也是一个空间的范畴。进言之，同样一则新闻报道，在某种时空情境下可能被认为是真的，在另外的情境下，则不然。前文《钱被风刮跑以后》即是如此，尽管它与客观世界并不符合，但在主观逻辑下却并无不妥，因而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认为是真新闻。“有闻必录”真实观，同样能说明该问题，它可以从受众和传者两个角度展开。就受众而言，在信息传播活动并不发达的晚清社会，人们能够判断报道真假的条件极为有限，也难以对新闻报道进行“证伪”，因而多半能够假设它是真的。就传者而言，彼时的信息采集与新闻报道都处于萌芽时期，能够采用“有闻必录”式的“全面”式报道已经解决了当时社会信息匮乏的主要矛盾，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受众的“新闻真实”要求，因而是可接受的。

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合法性的确定并不是一个静态现象，它需要持续不断地维护与修正，新闻活动的合法性常常受到来自新闻主体本身以及公众成员的质疑”（Clayman S. E., 2002）。在网络化的今天，人们对于新闻的“知识合法性”要求始终处在变动之中，它也因此迫使人们去思考，报道内容与媒体行业在新的“生存世界”中将如何调整与改进？与此同时，“新闻真实”作为绕不开的话题，又将发生哪些新变化？这些，都值得进一步关注。笔者坦言，从“假设真实”的角度来解读“新闻真实”时所得出的观点，并不能回答关于“新闻真实”的所有问

题, 仅仅尝试着转换了思路, 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再次借用吴康宁的“假设人”观点来说, 本研究充其量也不过只是一个假设而已。

(责任编辑: 朱立芳)

注释 [Notes]

1. 诸如“宏观真实”、“本质真实”等观点在多数学者的文章中已提出质疑, 本文未予赘述。可参见蒋晓丽、李玮:《从“客体之真”到“符号之真”: 论新闻求真的符号学转向》,《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6期; 秦志希、涂艳:《对新闻真实及“宏观真实论”思维的反思》,《新闻界》2001年第2期; 等等。
2. 这里需要一个前提, 即新闻报道必须关注现实世界, 我们的推论才可能成立。卞冬磊认为, 现代意义上的新闻确实是关注现实世界而非“前人世界”或“后人世界”。参见卞冬磊:《“社会世界”的更新: 新闻与现代性的发生》,《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2期。
3. 此处是将“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作为一个观点来理解, 认为它值得怀疑。但如果将它作为一种职业信条, 目的在于强调“真实”的重要性, 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
4. 秦志希等人认为, “本质真实论”和“宏观真实论”虽在内容上有所差别, 但思维目的和思维方式是一致的。这两种观点是真假认知判断和好坏价值判断两者的杂揉, 而真实问题和价值问题又是两回事。参见秦志希、涂艳:《对新闻真实及“宏观真实论”思维的反思》,《新闻界》2001年第2期, 第23-25页。
5. 这里可以用“真实性”理论予以解释。不过, 当前新闻学界对“真实性”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 这从诸如“truthfulness”、“authenticity”等各不相同的翻译便可管窥一二。因此, 如欲讨论“新真实性”及其与“新闻真实”的关系, 只能另撰一文。
6. 台湾学者陈顺孝在《新闻控制与反控制: “纪实避祸”的报道策略》一书中, 便展现了新闻媒体在多方权力之间苦苦平衡的现实局面。他认为, 正是因为多维权力主体的介入, 新闻学当中的“客观性”理念并不能作为台湾记者展开新闻报道的主要策略, 他们所采用的往往是一种“纪实避祸”的报道策略。
7. 此处只从认识论维度来考虑问题, 并不涉及媒体的道德伦理与职业信仰等问题。

引用文献 [Reference]

程天君(2012). 在生存的世界中假设——《在假设的世界中生存》读后.《高等教育研究》,33(11),6-12.

[Cheng, Tianjun (2012). Assuming in the world of existence——a review of “living in the world of assumption”.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33(11), 6-12.]

邓名瑛(2004). 真实性及其伦理边界——对新闻真实性原则的伦理反思.《伦理学研究》,(3),40-44.

[Deng, Mingying (2004). Truth and its ethical boundary. *Studies in Ethics*, (3), 40-44.]

郝鸿军(2007).《知识的合法性》. 吉林大学博士论文. 长春.

[Hao, Hongjun (2007). *The legitimacy of knowledge*. Doctoral dissertatio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何光先(1983).《新闻实践漫谈》.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He, Guangxian (1983). *Talking about news practice*. Beijing: People's Daily Press.]

胡翼青(2012).《传播学科的奠定》.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Hu, Yiqing (2012).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 Beijing: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黄旦(1997).《新闻传播学》.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

[Huang, Dan (1997).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angzhou: Hangzhou University Press.]

黄旦(2012).报刊是一种交往关系.《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6(6),96-100.

[Huang, Dan(2012).Newspaper is a kind of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36(6), 96-100.]

黄旦(2015).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国际新闻界》,37(1),75-88.

[Huang, Dan (2015). Remodeling Journalism: a networked relations perspective.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37(1), 75-88.]

黄凤鸣主编(2007).《2007中国广播影视理论研究》.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Huang, Fengming (ed.) (2007).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Chinese radio and television in 2007*. Beijing: China Broadcasting & TV Publishing house.]

吉登斯(2012).《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吉登斯讲演录》(郭忠华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Anthony Giddens (2012). *Nation-state in the global age(Trans.)*.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

蒋晓丽、李玮(2013).从“客体之真”到“符号之真”:论新闻求真的符号学转向.《国际新闻界》,35(6),15-23.

[Jiang, Xiaoli & Li, Wei (2013). From objective truth to semeiotic truth: semeiotic orientation of truth-seeking in journalism.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35(6), 15-23.]

李秀云(2004).《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北京:新华出版社.

[Li, Xiuyun (2004).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journalism in China(1834-1949)*. Beijing: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李长伟(2007).人的教育:超越假设的世界,迈向意义的世界.《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6(1),21-29.

[Li, Changwei (2007). Man's education: transcending the world of assumption and making for the world of meaning.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6(1), 21-29.]

利奥塔(1996).《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79年).

[Lyotard (1996). *The condition of post modernity (Trans.)*. Changsha: Hunan Arts Press.

-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9).]
- 林枫(2005).《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视角的系统阐释》.北京:新华出版社.
- [Lin, Feng (2005). *Marxist view of journalism: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perspective*. Beijing: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 刘青松(2012).《天朝的天窗:晚清最后十年报刊风暴》.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Liu, Qingsong (2012). *Journalism in the last ten years of late qing dynasty*.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 宁树藩(2003).《宁树藩文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
- [Ning, Shufan (2003). *Collected works of Ning Shufan*. Shantou: Shantou University Press.]
- 芮必峰(1997).新闻本体论纲.《新闻与传播研究》,(4),52-64.
- [Rui, Bifeng (1997). The ontology of news.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4), 52-64.]
- 芮必峰(2004).新闻与新闻报道.《新闻大学》,(2),17-21.
- [Rui, Bifeng (2004). News and news report. *Journalism Bimonthly*, (2), 17-21.]
- 申报(1872年4月30日).本馆告白.《申报》.
- [Shen Pao (Apr,30. 1872).Confession of the newspaper office. Shen Pao.]
- 申报(1884年9月2日).粤海钓徒来稿.《申报》.
- [Shen Pao (Sep,2. 1884). Manuscript from the guang dong angler. Shen Pao.]
- 王辉(2012).瞬间与无限:新闻真实的两种理解方式.《国际新闻界》,34(2),45-50.
- [Wang, Hui (2012). Momentary and infinity: two ways of understanding news truthfulness.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34(2), 45-50.]
- 王亦高(2006).试论新闻报道中的“证伪”.《国际新闻界》,28(2),40-43.
- [Wang, Yigao (2006). Falsification in news coverage.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28(2),40-43.]
- 吴康宁(2005).在假设的世界中生存——关于人的一个假设.《高等教育研究》,26(9),32-39.
- [Wu, Kangning (2005). Living in the world of assumption——an assumption of man.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6(9), 32-39.]
- 西皮尔·克莱默尔编(2008).《传媒、计算机、实在性: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孙和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98年).
- [Sybille Kraemer (ed.) (2008). *Media, computer and reality (Tran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8).]
- 胥亚(2004).《新闻导论》(第2版).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 [Xu, Ya (2004). *Introduction of journalism (2nd Ed.)*. Changsha: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徐宝璜(1919).《新闻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Xu, Baohuang (1919). *Journalis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杨保军(2005).新闻真实实现的含义与内在要求.《当代传播》,(5),4-6.

- [Yang, Baojun (2005). The meaning of news truthfulness and the way to achieve it.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5), 4-6.]
- 杨保军(2006).《新闻真实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Yang, Baojun (2006). *Truth in journalis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姚君喜(2007).新闻真实性的意义阐释.《社会科学》,(6),93-101.
- [Yao, Junxi (2007). Explaining the ignificance of news truthfulnes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6), 93-101.]
- 张小元(2007).《新闻:真实性或者客观性——一种现象学路径的分析》.载罗以澄、秦志希主编.《新闻与传播评论》.武汉:武汉出版社.
- [Zhang, Xiaoyuan (2007).News: Truthfulness or objectivity. In Luo, Yicheng & Qin, Zhixi (ed.),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view*. Wuhan: Wuhan Press.]
- 钟蔚文等(1999).新闻事实的逻辑.《国家科学委员会研究汇刊:人文及社会科学》(台北),9(4),575-589.
- [Zhong, Weiwen et al. (1999). The logic of news fac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Part C: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aipei)*, 9(4), 575-589.]
- Clayman S. E. (2002). Tribune of the people: maintaining the legitimacy of aggressive journalism.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4(2), 197-216.
- Park, R. (1940). News as a form of knowledge: 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5(5), 669-686.
- Karlsson, M. (2011). The immediacy of online news, the visibility of journalistic processes and a restructuring of journalistic authority. *Journalism*, 12(3), 279-295.